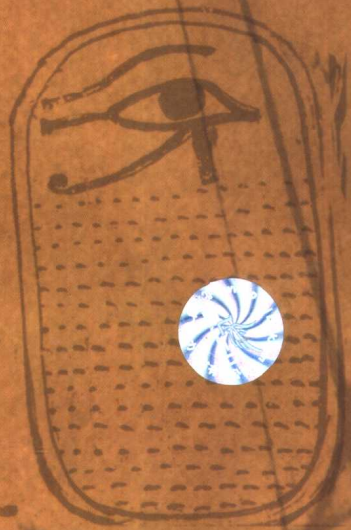


时代思想与艺术丛书

# 语文教育 门外谈

钱理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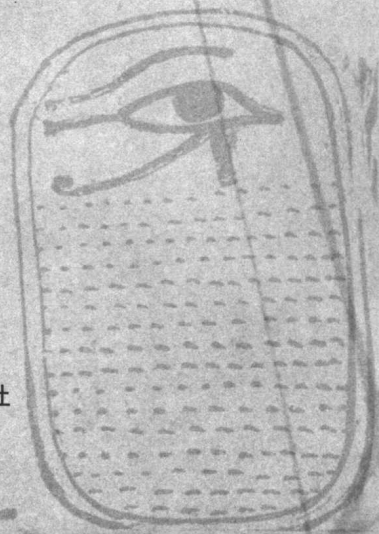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代思想与艺术丛书

# 语文教育 门外谈

钱理群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教育门外谈 / 钱理群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

ISBN 7-5633-4101-3

I. 语… II. 钱…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文集 IV. G633.3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532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区计委印刷厂印刷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 91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24

印张: 19.5 字数: 48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8 000 定价: 2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卷一 以“立人”为中心

---

- 3 以“立人”为中心——关于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的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考
- 28 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忧虑
- 40 “教育中国”:我们的世纪之梦——《人文学者谈教育》序
- 45 “名作重读”与我
- 49 也说“语文与人生”
- 52 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钱理群访谈录
- 58 用文学经典滋养下一代——《20世纪中国文学名著中学生导读本》序
- 61 追求文、理的融通——理科“大一语文”开场白
- 69 “往那里去?!”
- 72 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
- 80 对《语文教学大纲》(初中部分)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 83 一点感想
- 86 孩子向我们发出的警示
- 93 西部开发中的教育问题之我见——答《甘肃日报》记者问
- 98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

## 卷二 我们现在怎样做老师

---

- 119 建设“立人的教育”——《阿爸教做人》序
- 125 教育的真谛——《爱,你准备好了吗?》序
- 128 向献身教育事业的罗老师们致敬——《中华诗词三字经》序
- 131 请关注少、边、穷地区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成功教育研究》序
- 134 关于文学教育的感言——《品味文学》序
- 139 我们现在怎样做老师——读王翔的书有感
- 143 请重视中学生课外读物的建设——读《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有感
- 145 关于鲁迅作品教学的几点思考
- 151 相濡以沫——与中学语文老师的通信

## 卷三 我愿意倾听你的讲话

---

- 177 说自己的话,说真话
- 178 对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应征文章的评语
- 183 点评两篇作文——为《著名作家学者点评全国中学生作文选萃》一书而写
- 185 写给年轻作者的几句话
- 187 和中学生谈鲁迅生平和他的创作
- 196 如何读鲁迅的《灯下漫笔》
- 203 曹禺《雷雨》导读

- 213 奇思异想背后的苦涩与悲凉——向中学生推荐鲁迅的《故事新编》  
215 我愿意倾听你的讲话——与大、中学生的通信

## 卷四 “网络评价”试验

---

- 237 我与清华大学的“网络评价”试验  
244 与中学生的网上讨论(一)  
255 与中学生的网上讨论(二)

## 卷五 《新语文读本》等的编写

---

- 275 《新语文读本》编者的话  
282 《新语文读本》编写手记  
325 《新语文读本》阅读建议(选)  
384 关于《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通信  
392 致于漪先生书——关于课外语文读物的编选  
397 关于中小学写作教育的断想  
424 关于《新语文作文》的通信  
436 识认你脚下的土地——《中学生区域文化读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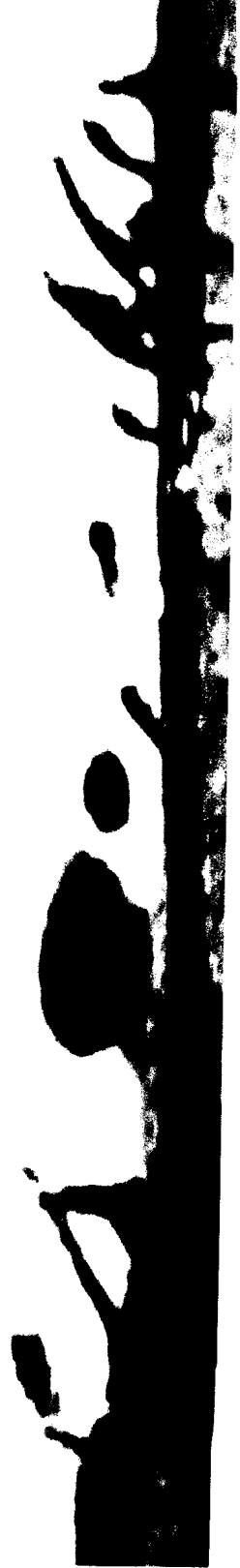
## 卷六 经历与怀思

---

- 441 童年的梦——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文
- 443 一切都从那时开始
- 446 离题的追念
- 448 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
- 452 我还感觉得到他的手温
- 455 愿老师与母校青春常在
- 457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与南师附中同学谈心
- 
- 463 后 记

卷一

以「立人」为中心







## 以“立人”为中心

——关于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的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考

谈中小学语文教育,对我来说,是一次跨界发言。——我的本行是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职是在大学里给中文系的学生上课。但这几年却与中小学语文教育频频发生关系,而且似乎有越陷越深的趋势。先是不满于学术界与教育界的隔绝状态,而为中学语文教师写了一本《名作重读》;后又应朋友之约,作了几次呼吁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访谈,写了议论语文高考的文章;现在又应邀参与了制定语文课程标准的工作。这当然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但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自愿的选择。除了因为我做过18年的中专语文教师,本就有缘之外,也是受到了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包括胡适、鲁迅、朱自清、叶圣陶等在内的一大批学术与文学前辈都对中小学语文教育表示过极大的关注;而更为根本的驱动,则来自内心,在自己历尽沧桑、步入老年时,又处于世纪之末,我越来越感到,或许为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做点事,才是更为实在而又有意义的——这几乎是看透了一切之后,惟一没有、也不愿看透的一点。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我投入这一工作时,却不能不时产生如履薄冰之感——毕竟离开中小学语文教育界太久,对一个自己并未进行过专门研究的领域发言,这是十分危险的。站在“门外”作一些激烈的批评是容易的,也是必要的;但不能只破不立——在这方面,20世纪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教训,而要立,就必须有研究。于是只得临时抱佛脚,趁着学校放暑假,放下其他工作,集中一段时间,读了能够收集到的有关材料,作了一些思考,写了一堆“随想”,但待要整理成文时,却又有些犹豫——实在并无新意,无非是受到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启示,对许多

语文教育专家发表的高见的一个响应而已,就算是读后感吧,或者说是一个新入门者交的一份作业也可以

## (一)

我的思考主要有四个层次: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教育—母语(汉语文)教育,就按这个顺序说吧

我首先考虑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所批评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弊端,在更深层面上,也许是反映了教育(或者说现代教育)自身的一些内在矛盾的。王富仁先生在他的《当前中国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历史依据》一文中,谈到了发展教育的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方面是国家的需要,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曾经蒙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的不发达的国家,为了尽快地建设独立、统一、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需要一大批适用的高中级建设人才,要求教育在国家的统一指导下,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服务;另一方面,则有来自社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特别是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要求以“人的健全、和谐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出发点与归宿)来展开全部教育活动。应该说,这两方面的要求,在现代中国都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因此,蔡元培等先驱者在20世纪进行最初的教育改革,为中国的现代教育提出总体的战略目标的时候,就同时考虑到了这两个方面。这就是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反复提到的,蔡先生一方面承认在“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较多,国又贫”的现实下,“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也当务之急”,因此提倡以为国家利益服务为目的的德、智、体教育;但他同时又提出要破除“极端之国民教育”和“极端之实利主义教育”,以为这是中外教育中的“两弊”,因此而提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世界观教育与美育教育,并且以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在20世纪初,鲁迅也提出过“立人以立国”的思想。在鲁迅看来,实现“近代文明”[也即今天所说的现代化],不但要“立国”,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更要“立人”,保证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发展。但先驱者的理想在20世纪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所具有的现实迫切性,教育明显地向国家的需要倾斜,形成了王富仁先生所说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也即蔡元培所要警惕的“极端之国民教育与实利主义教育”],并曾一度发展到以转变人的政治立场为中心的“政治主义的教育”。按王富仁先生的分析,到了20世纪末,在国家建立了基本的建设规模,人民基本上解决了温

饱问题以后,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人的发展自身的要求,就逐步凸现出来;而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实践中,又出现了教育的改革滞后于经济的改革与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向,从而产生了“中国经济体制的社会化发展和中国文化思想的社会化发展同中国教育固有的国家主义性质之间的矛盾关系”,“激发出了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呼声”。

我同意王富仁先生的分析,只是想在他的基础上,再作一些深入的讨论。所谓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中国除了反抗外来侵略,实现国家独立与统一之外,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在1949年以后,更是明确提出了“赶超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现代化。我们所说的“现代教育”实际上就是为实现这一现代化目的服务的教育。王富仁先生所说的“国家主义教育”,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视为一种适应国家工业化要求与“赶超”战略目标的现代教育。为实现“赶超”,所谓多快好省地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于是就建立起了国家包揽、控制一切的高度集权、统一的计划化的刚性教育体制,不但完全取消了教育的社会职能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也剥夺了所有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自主权。而工业化所要求的是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专门人才,强调知识的专一化与标准化。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现代性的逻辑”渗透于整个教育,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理念,如重实用知识,轻普遍知识;重科技,轻人文;强调理性,压抑非理性;强调知识的积累,压抑知识的创新;强调职业技能的训练,压抑心灵、智慧、能力的开发;鼓励思维与行为的趋同,压抑逆向的〔批判性〕、发散性的思维;强调被动的接受性的教育,压抑主动的创造性的教育……据教育学专家介绍,长期以来在我们教育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以知识量的多少与部分抽象逻辑智力高低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智力观”与相应的教育评价标准〔见《脑科学与儿童智力发展报告》〕,这正是前述“〔教育〕现代性的逻辑”所致。而这背后更是隐藏着一种目标预设,所要培养的是这样的人才:“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以后在社会上就是上级、长官〕的意图、要求;自觉地压抑自己的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规定、社会规范〕办事’,做到恰当而有效率,并且能够以明确、准确、逻辑性很强而又简洁的语言文字,作出总结,并及时向‘他者’汇报。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力、情感力与想像力,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

们也是齿轮与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的双重齿轮和螺丝钉。”[参看拙作:《“往那里去?!”》]或者如有的作者所说,培养的是“有知识无智慧,有目标无信仰,有规范无道德,有欲望无理想”的畸形人才[李正涛:《没有灵魂的教育》],这大概也是人的一种异化吧。我们所面对的,正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知识有效率的专门科学技术人才,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与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与今天我们整个民族是在追求现代化与反思现代化的矛盾张力中寻求发展一样,在教育上,也同样要在承认“现代性逻辑”的某种合理性,注重知识的积累,科学理性精神的发扬,逻辑思维能力与语言的准确性、简明性的培育与训练,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与警惕、防止教育与人的工具化,注重对人的知识创新能力,思维的批判性、发散性的培养,人文精神的熏陶,想像力、创造力的开发这二者的矛盾张力中寻求发展。或许我们可以在“促进学生个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一点上,寻求到二者的某种统一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用鲁迅当年的说法,把今天的教育改革所要建立的指导思想,概括为“以‘立人’为中心”的教育观。

## (二)

强调九年制义务的、基础的教育,也是标志着教育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的:从把整个教育围绕着“培养少数精英人才”[即所谓高精尖的技术人才,这也是所谓应试教育的一个要害]转到注重对全体国民的基本素质的提高,实际上也为造就精英人才提供更为深厚的基础,这对民族、社会、国家的未来发展,自然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由此应该强调两个基本的教育观念:公平的观念与参与的观念。

所谓义务的、基础的教育就是面对所有的人[适龄公民]的教育,这里隐含的正是“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这就是说,一切适龄公民,不受地区、性别、民族、地位……的限制,无一例外地都要受到完整的基础教育,为终生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基本的保证。对国家来说,这是它对纳税人的基本义务,因此,绝不允许任何商业的观念与行为渗入义务教育中;对每一个人来说,这是基本教育权的享有——这是基本的人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一切对义务教育权的剥夺,无论是来自哪一级政府,还是监护人,都应受到法律

的制裁。记得在1999年初,《北京观察》曾发表了对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专访,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关于“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提出要“使农民成为‘自由人’”的农村改革方向,他认为,关键是要“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除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以外,还“要使每个农民都能受教育”,“农民应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提高他们的竞争地位,在起跑线上就会处于平等的地位”。我以为,杜老的这一意见是十分深刻,抓住了要害的。它启示我们,所谓义务的、基础的教育,其实质就是要保证每一个国民的自由发展[受教育正是人获得自由的前提],在成才与经济竞争的竞争中,取得起点的平等;我们的目标不但要争取经济上的共同富裕,而且也要追求智力、精神上的共同发展,而这两者又是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的。而在发展义务教育,推动素质教育中,不但要注意城市教育,更要在农村教育[包括中西部的边远的、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上下大力气,这不仅因为中国公民的多数仍在农村,而且素质教育要求高质量的师资,更为良好的学习环境,在这些方面农村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据我看到的北京五中的《中学生听力发展现状》的调查[作者梁捷],其中一项就谈到“城乡环境不同而听力差异是显著的。城市中信息交流频繁、人际交往密切、社会活动丰富、文化生活多样等,都有利于听力的提高”。这正提醒我们,如果不对农村[以及边、少、贫困地区]的教育实行适当的政策倾斜与扶持,要实现公平的教育是困难的。有不少人担心,实行素质教育[包括高考的改革]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尽管我并不同意将素质教育与公平原则对立起来,但我认为提出努力缩短城乡教育的差距,防止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仍是必要的。而且在我看来,农村学校素质教育也有自己的有利条件,比如农村的环境,使孩子时时面对大自然广阔、自由的空间,这对儿童想像力、感悟力的开发,精神空间的开拓,都是大有好处的。农村教师,特别是语文、音乐、美术课的教师,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问题是要给予适当的引导、帮助与支持。

要实现基础、义务教育的公平性,除了使每一个人都获得学习的机会,还要有使每一个学生都有达到学习目标的保障。基础、义务教育的每一个课程的目标,都是最基本的,最低的要求,也就是每一个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公民都必须达到的。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的让步。为了使人人都能有效地学习,必须实行个别化的教学,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因材施教的原则。要根据每一个人的特点,去开发他的智力,最大限度地

发挥其学习的潜能。已经有学者提出,可以利用现代技术[例如网上技术]为每一个学生都建立学习档案,用科学的手段测试学生的学习能力指标,不断进行调整,以确立针对每一个学生的智力开发的最佳方案,这对落实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设想。

义务教育尽管主要是由国家承担,但它同时要求着社会的广泛参与。语文教育界的许多专家都提出了“大语文”的概念,强调营造健康、健全的社会语言环境,利用一切语文学习机会,广泛开发社会与生活的语文教育资源,这是很有道理的。北京市曾进行过“对学生语言影响最大的因素”的调查,结果依次是同学、广播电视、家里人与语文教师[见梁捷:《“中学生说话习惯与心理”调查分析及对策》]。这一结果自然是暴露了语文教学中的重大问题,但却也说明社会对学生语言的影响力不可忽视。这种影响应该说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的因素,减少消极面,要形成“全民关心孩子的语文素质的提高”的观念与风气,在这方面是存在着很大的潜力的。中国的父母、家人是关心孩子的学习的,问题是要将被动地陪着子女共同应付考试,变为主动地进行语言的熏陶,如为幼儿朗读作品,经常与孩子作有准备的交谈,等等。因此,今后不仅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也应不断给家长提供对孩子进行语言训练的材料与手段。

### (三)

我们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问题。

多年来语文界一直存在着语文教育的性质之争,主要有工具说与人文说,经过讨论,许多人都倾向于“二者不可偏废”说。我倒是赞成陆志平先生的意见:“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从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出发,结论也许会更科学。”[《中小学语文教改若干问题的思考》]王富仁先生大概也是这种观点,他强调,今天的语文教学“应当回归到人与语文的关系中来思考,回到语文教学对人的成长和发展的作用中来思考”,“它不是否认语文的工具性,而是要把这个工具交到能自由使用它并为人的精神发展服务的‘人’的手里”[《当前中国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历史依据》]。围绕

“语文与人”，自然也还有“语文与文化”、“语文与精神”、“语文与社会”这样一些问题〔据吉林教育学院王鹏伟先生介绍，日本东京堂1956年版《国语教育辞典》也提出了这四个方面的关系，认为这应是“思考国语科的使命、意义和目标”的基础〕。

很多语文教育专家都谈到了语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正是通过听、说、读、写，不断地丰富与发展自己的内在生活、心灵世界，开拓精神的自由空间，开发自我的思维力、想像力、创造力，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外来的〕发生联系，与外部世界〔他人、社会、自然、宇宙〕进行交流。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不学语言〔特别是母语〕就不能成为人”。这个方面已经谈得很多，在下面具体讨论中也还会进一步展开。这里想从两个方面就语文对人的发展的基础意义，作一点发挥。我们如果从“新的时代变革对人的要求有什么变化”这一角度来提出与思考问题，就会注意到，在未来的信息社会，知识的不断开拓、更新中，社会的职业，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都会出现多变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这就提出了“以创造性的应变能力为本位的个体人才观”，并由此提出了终生学习的观念〔参看袁振国：《培养创新人才是教育的最高目标》〕。也就是说，人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来不断丰富、开发、调整自我，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建立与发展新的联系。而语言〔母语与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正是为这样的终生学习打基础的。这就是说，在学校里，特别是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所能学到的知识是有限的，但如果具有了较强的读、写、听、说的能力，就能为终生的学习、不断汲取新知识，提供无限的可能性，语文学习的基础意义正是体现在这里。另一方面，中小学语文教育也是为“做人”打基础的。本来整个中小学教育都有“育人”的任务，但必须承认，语文教育在“育人”方面有着特殊的功能与意义。这是能够用人们的经验作证明的：几乎每一个成年人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成长时，恐怕都会提到中小学语文老师对自己的影响与引导，这大概不是偶然。道理也很简单：语文教育所用的教育材料是语言文字，是各类文体的文章，文学作品又占据了很大的比重，都无一不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样的精神灌注、文化熏陶也是影响终生的。这就是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反复强调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为“人打‘精神的底子’”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小学语文教育主要应培育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彼岸理想世界的向往与想像，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并由此焕发出内在与外在的激情，生命的活力，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永不停息的精神的探索，永远不满足于现状



的批判与创造的欲求。所有这些宝贵而美丽的精神素质可以概括为“青春的精神”。它既符合青少年的生理与心理的发展的特征,同时也是一个人的健全生命的基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道:“人在年轻时代以这样的精神素质垫了底,以后无论遇到了什么艰难曲折,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的、精神的危机,都能从容应对,坚守住基本的精神防线,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势,不至于在精神上被压垮。”[《愿老师与母校青春常在》]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永葆青春吧。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在课程目标设置上应该怎样提,还可以再研究。我看日本语文课程目标里,就有类似的要求,如“要培养有着充实的内心,健康有活力的人”,“特别要充实被自然和美的的事物感动的情操,培养健康有活力的生活态度”,等等。总之,从语文的基础性质出发,我想强调的是“打底子”的概念:打好终生学习的底子与终生精神发展的底子,以保证每一个人的“一生可持续发展”[这是倪文锦先生在《语文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一文中提出的概念]。这应该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的语文基础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

以上算是偏于理念的讨论。下面再从语文教育的三个基本要素:知识、能力、习惯的研讨中作具体的展开。

语文教育当然要有学习知识的内容,台湾省制定的《国民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就有“语文常识,包括语法、修辞法、文章作法、应用文作法、文字基本构造、书法、工具书使用法、标点符号使用法及演说辩论法”这样的具体规定,大陆以往语文知识教育大概也包括这些内容。但问题可能出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义务教育的“基础性”认识与强调不够,一是实际上是以语文的知识体系为整个语文课程体系的中心,这就导致了过分地追求语文知识自身的系统性与学术性,产生了内容偏深、分量过重、要求过高、烦琐、陈旧等弊端。现在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指导思想,明确以“语文的能力训练”为整个语文课程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语文知识的讲授要有助于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与提高,应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对现有的语文基础知识进行重新清理。

关于教材的选目,因没有专门的研究,只能说说想到的两点。一是应以一批经典名作作为基本的相对稳定的选目,在课外阅读中更是应以经典名作为主。我赞成要规定一个每一个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国公民的“必读经典名作书目”。这是因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都凝聚于其中,人类最美好的创造都汇集于其中,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各类学科(不只是文学,还有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